"民工潮"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贾金荣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民工潮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深化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农民和农村人口的临时性的机械迁移,是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运行引发的一个社会经济现象。从另一种视觉来看,民工潮包含的两个社会流动过程:涨潮(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下降的社会流动过程,而落潮(民工回乡)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民工潮是增强我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乡的稳定发展也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对民工潮的疏导是长期性工作,除了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乡镇经济发展,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尽量就近转移外,政府的服务工作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关键词:民工潮;农村;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3)01-0136-08

"民工潮"是对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来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大规模、季节性从农村向外地,尤其是大中城市迁移并向农村回归这一周期性发生的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每年大约有超过8000万的农民参与民工潮中[1]。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本文试图对其从社会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加以分析。

一、现象的社会学描述

"民工潮"形成于农民因异地就业而发生的居住地的临时性迁移。民工潮的形成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农业对农村劳动力容纳的有限性,换句话说,农民对农业更多的劳动投入已经无法再获得与之相应的更多的回报;二是农民可以有新的农业外的劳动就业选择。但是,单纯具备这两个条件,还不足以使农民离家外出找工作,价值观念的转变构成了民工潮形成的个体主观方面的因素。所以,民工潮实质上包含了三重过程:居住地(在城市与乡村或家乡与他乡之间)、职业和身份(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在作为独立职业者的农民和雇工之间)的阶段性轮换,传统价值观念和农民特有的观念的(部分或全部的)改变。

居住地的迁移对民工潮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农民在职业方面的变换,并不一定引致他们的迁居。在农村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们就可以更多地选择离农不离乡,他们的职业变换由于对农业的兼业化经营也显得更为经常,但这部分农民却不需要加入民工潮。农民单纯性地改变其居住地,如走亲访友,可能会放大民工潮的某些社会作用,比如说造成交通运输的紧张局面等,也无法构成民工潮。农民长期处于一个个相对闭塞的乡村社区中,到陌生环境中去生活、劳动,需要很大的勇气,没有大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没有伙伴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的建立,要让一个农民离乡背井地外出打工是不大可能的。

民工潮的涨落,反映民工们离乡和回归的机械迁徙过程。民工潮的初期,其涨落的周期取决

收稿日期:2003-01-06

作者简介:贾金荣(1966-),男(汉族),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农民们主要是在农忙后外出打工和在农忙前回家收种。现在(成熟了)的民工潮则主要是以农历年为周期,在春节后和春节前形成其涨潮期和落潮期。这表明,参与民工潮的农民已经基本逸出了农业生产劳动。

二、社会分层理论的概述和引申思考

社会分层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提出划分社会层次必须依据三个标准,即把财富作为经济标准,地位作为社会标准,权力作为政治标准。他认为这三条标准作为分层尺度是密切相关和相互联系的,部分是重叠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标准都可以转化为其余的两个。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或互相代替,各自可以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一个尺度,财富的差别产生阶级,地位的差别产生身份群体,权力的差别产生政党。财富、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是其分层理论的核心。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存在着社会流动,即人们在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个体的社会层次的上升和下降。

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产生了其它的一些分层理论和方法。如现代西方社会学中就有人认为:社会范畴的文化价值和实际的权力状况是产生垂直的社会区别的前提。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并与其上和下相区别的群体和家庭构成一个社会层次。一个社会可以被划分为上层、中层和底层这三个基本社会层次。划分的客观标准,在封建社会是权力和义务,在农民社会(圈)是土地和牲畜占有的多少和方式,在工业社会里则是收入、受教育水平和住房面积。由于人们主要在各自的层次内居住、交往、联姻、形成观念,因此每个社会层次里都发展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倾向于与处于同一社会层次中的人们游戏、打发休闲时间、交谈、婚配、聚居,并与处于其他社会层次中的人们保持某种距离。社会的上层以财富、奢侈品、仆役、悠闲和权力为标志,底层则可能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贫穷、依附(不自主)和被忽视等[2]。

上述的社会分层理论还启发我们进行诸一些引申性思考。

(一)社会流动的规模和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差异较大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因为权力的相对垄断(如皇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明(如君臣、主仆),阻碍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层次间流动的障碍多(如政治和经济垄断),途径少(如封建社会单一的科举制度),流动的规模小。现代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Max)应该是先于韦伯对社会进行分层研究的伟大实践者,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按对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占有区分为两大阶级:作为上层的、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作为底层的、依附于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基于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社会流动的阻滞而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其社会层次的上升,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公民在宪法范围内享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不同社会层次上的群体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国家可以按照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愿望,在保护必要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满足社会成员实现个人社会流动的愿望。

(二)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分层是社会流动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一个社会对它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行的调整包括:(1)主动的调整,如封建社会新皇登基后实行新政,西方国家定期的民主选举(新政府总要实施一些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我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等;(2)被动的调整,如社会革命、政变等[3]。因为处于相对底层的社会群体总是存在着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愿望,如果他们所处的社会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社会流动机制,提供可选择的途径,使他们有较多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激励他们通过社会所认可的途径,依靠个人努力工作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去获取财富、地位或权力,社会就能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他们求变无门,必然最终采取自己的方式,用过激的办法,挺而走险,制造社会冲突,甚而促成社会革命,实现社会流动机制的被动调整。

因此,一个社会应该具备一定的能够不断及时构建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的能力,以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正常的"升迁"渠道,将个人的社会流动愿望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避免社会成员因为这种个人愿望无法实现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的长期积累。我国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有目的性的社会经济的政策性调整,如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发展股份制等多种现代化的经济形式,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公平的途径,来满足其社会层次提升愿望的许多社会措施,比如通过提供充分有效的教育帮助,让处境劣势的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参与到社会竞争中来,从而增加底层社会成员提升其社会层次的机会的社会政策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4]。

三、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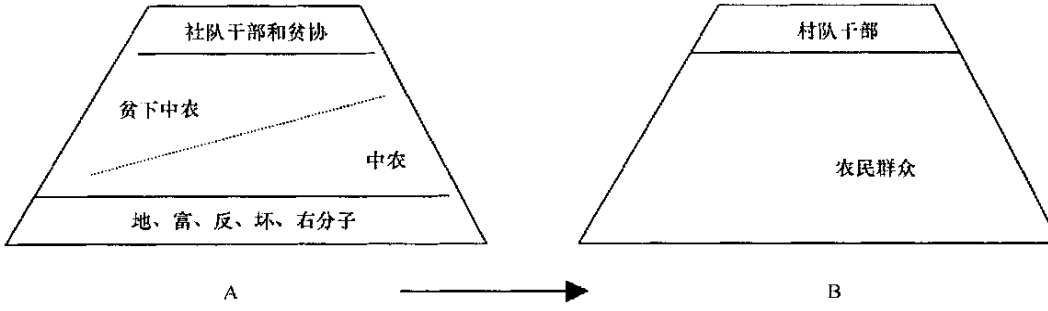
对民工潮的研究要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演进中探寻其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由于实行城乡分治的社会政策和工业大倾斜的经济政策,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人口流动基本停滞,农村和农民极度贫困,作为我国人口多数的农业人口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当时的整个社会,从社会地位来看可分为两大层次,即作为领导的"工人阶级"(非农人口)和作为其"联盟对象"的农民(农业人口)。这两大阶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关系不言自明,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可以说是农村居民唯一的向上的社会流动途径,而被下放、把户口从城镇强制性地迁到农村则经常被作为一种惩罚性的社会管理措施而使用,自然是代表了社会成员向下的社会流动。在农村内部,阶级成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形成了图A所示的社会分层模式(图中各部分的面积大小关系不代表各层次准确的人数比例关系。下同):改革前,从权力占有来看,我国农村实际上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社会层次。上层是社队干部和贫协代表,中层是贫下中农及中农,底层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权力占有关系也基本决定了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们的社会地位关系和以家庭生活水平为标志的财富占有状况,贫农们被要求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划清界限,上两个层次与底层的通婚也几乎都不存在了[5]。

到七十年代末,中央宣告文革结束,对文革中农村的管制对象,实行摘帽和解除管制并一视同仁,接着推行了农业改革,实行了农业生产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重新直接结合在一起,农业生产力得到顺利释放,获得了农业增收,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我国当时农村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使农村的社会分层有了很大变化,变化后的农村的社会层次关系可以用梯形图B来演示。图B显示:通过改革政策的调整,我国农村按权力和地位划分的社会分层简化为两个层次,即村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图B与A相比:贫协成员归为普通农民,权力层次和地位相对下降,而原来的社会层次的底层得到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被赋予与其他普通农民同等的政治权力而提高,在经济方面,两个层次间差别不大,但原来的上层群体因历史积累和延续应稍微占优。

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个人在乡镇集市经商到1993年中、小城市对农民开放,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民们不仅获得了较充分的经济自由,拥有了农业经营自主权,被允许从事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务工"及经商,而且还获得了较大的社会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身自由,他们可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外出和进城。这给予了农民们在整个社会中提高其社会层次的机会,催生了一批八十年代的“农民万元户”,使得农民作为贫困代名词的状况得到很大改观,让农民们看到了改变历史境遇的希望,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新途径。这是民工潮爆发的政策条件和社会基础。

那么在农村中哪些人最可能先与他人走出乡村,成为民工呢?村干部阶层的人不太可能,他们熟悉政策,在当地有可资利用的各种便利条件(如社会关系,集体资源的优先使用等),他们会通过利用这些条件,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地位,而不是去当民工,而原来的(图 A 中的)社会底层成员,他们长期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渴望改换门庭,成为离乡背井的民工,那时对他们而言利甚至大于弊,所以他们最可能成为早期的民工。与此同时,原来的社会中层会逐渐跟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先富起来的农民中,村队干部和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占较大比例这个问题(农民们戏言:过去的地主还是“地主”,贫农依旧还贫)。在民工成潮之前,民工们对城市社会生活和工作尚未形成大的影响,并没有在城市里被“怨声载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经济因素取代了政治权力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家庭经济状况成了决定人们社会层次归属的第一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由他拥有的经济实力来决定。我们仍然借助于社会分层梯形图来说明其演变过程。按图 C 的演示,总体上可以将我国农村现阶段的农民分为三个层次:上层是富裕农民,他们是农村里先富起来的人,有充裕稳定的收入来源;中层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的农民大多数,他们的家庭收入较稳定但还不够充裕,能保证衣食住行无大碍;最下层是贫困农民,他们或收入低而无保证,或因家庭特殊问题(比如,为家庭成员医治疾病、经营活动遭遇挫折等)而入不敷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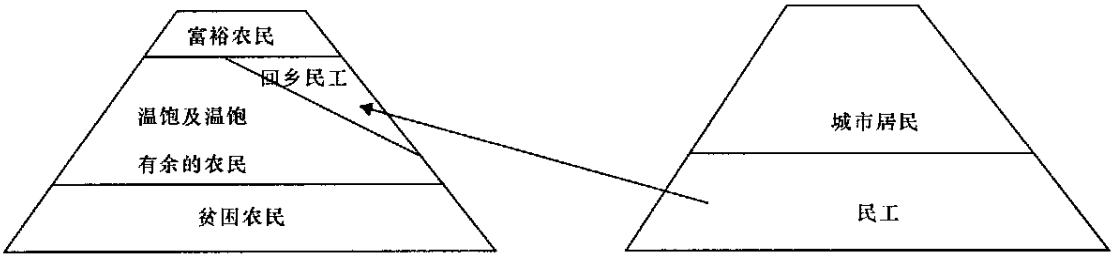
那么,现在的民工潮主要来自哪些社会层次呢?

富裕的农民们一般不可能加入民工潮。打工是很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家庭的重要或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很多人正是依靠打工达到了温饱,还必须靠打工维持温饱(也就是维持他们的社会层次),而另一些人还想通过打工,为向更高社会层次流动创造必要的条件,他们都是构成民工潮的主要群体。而陷于贫困的农民也常常希冀能找到打工机会,解决温饱问题,提升社会层次而加入民工潮,构成了民工潮的部分来源。

如果说民工潮形成的初期,农民们是单纯出于通过打工增加收入的目的而外出,那么,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农民外出打工已经不再单纯出于经济原因。能在外面找到挣钱机会,在很多农民眼里,不只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还代表一个人有阅历和见多识广,提高了他在其所属的社会层次及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参考图 C)。所以,许多农民有了一两次当民工的经历,还会经常性再当民工。经济(以收入水平和家庭富裕程度为标志)和社会地位(以在群体中的声望和号召力为标志)作为个人社会层次的主要标准,是民工潮形成的重要内在动机因素。

民工们的周期性回归形成民工潮的落潮。民工们为什么要定期性回乡?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 D

人们会习惯性地只简单认为,他们要回家过年,与亲友团聚。可是,怎么解释拖儿带女,在外面过家庭生活的民工们也要回乡呢?从农村出来的、在城里成了家、成了城里人的那些人却并不那么紧迫地回老家过年?借助于社会分层理论,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即使是农民大款,在城市里也会有被城里人看不起、低城里人一头的感觉。在城市里,连城里的"弱势群体"也敢瞧不起民工,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才会给他们干,还经常地会遇到不付或少付工钱的事,而且还时常被与各种城市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并因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失落了做人的尊严。这里不必对城市社会做具体的社会分层研究,但可以肯定,民工们构成我国城市社会分层中的最底层(参考图D)。实际上,民工们在城市里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接纳过,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会属于城市,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他们既没有被城市社会认同,也没有认同城市社会。回乡不仅仅能够使他们重新享受到与亲朋团聚的喜悦和与熟悉的大自然亲近的快慰,还使他们回归于属于自己的社会,并进入到一个较高的社会层次中(对比图D和C),重新体验做人的尊严和受尊重的荣耀,而这一切都足以洗涮身后的那些委屈,让疲惫不堪的身心得到休养生息。就此而言,涨潮可以视作一个下降的社会流动过程,落潮相反代表了一个上升的社会流动过程,对民工而言,民工潮的涨与它的落一样必要,涨是为了落,落是为了(有勇气)再涨。

通过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从图A到B,是一个社会分层简单地调整过程,即国家政权通过简单地赋予(底层)社会成员和取消部分上层(贫协)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达到社会分层的局部变化;从图B到C,既表示新的社会分层代替了旧的社会分层,也包含了一个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制定了必要的和相对公平的政策规范,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在此之下"寻求"社会流动,所以,这也是一个有活力的新机制。当然,这个新机制也会有失去活力的时候,那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四、结论及建议

在对民工潮的分析中,人、即农民们的社会流动愿望是一条主要线索。"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寻求社会层次的提升是农民成为民工的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因为对很多农民来说,守在家里,当农民,干农业是没有希望的。

(一)民工潮是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和新的社会流动机制起作用的结果,有利有弊,但利远大于弊

民工潮出现于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之后,表达了农民通过追求财富以提升社会层次的愿望。民工潮就是农民们在我们国家为他们所提供的、正常的、可实现他们社会流动愿望的途径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从中央政府对民工潮的态度看,他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受到了尊重的。从以前各大城市对民工"管"和"赶",到现在每年在潮起潮落的高峰期,政府都指示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运输工作,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而国务院总理在2002年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民工作为需要社会扶助的一个重要的"弱势群体"正式提了出来。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农民进城打工的经济意义: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城市工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保证了农业的物质投入,促进了我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农民进城打工的社会意义:在城市里增加了一个社会底层,使原先的城市社会中的底层的地位相对提升,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形成了必要的社会流动,增强了整个社会活力而又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民工潮潮起潮落,也使现代文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更直接、更有效,是我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量变的累积过程。

民工潮不利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是:对城市现行管理体制形成了较大冲击,诱发了一些城市生活的局部无序现象。但是可以相信,通过必要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以及法制的健全,随着城市文明对进城民工的熏陶,民工潮引起的这方面的问题会不断得到改善。

(二)民工潮还要持续一个时期

首先,民工潮的产生有其制度性原因,是我国土地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和企业用工制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农村和城市改革还有待继续深化。

其次,城市膨胀,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伴生现象,民工潮是它的“中国特色”。从农村人口占主导的人口结构发展到城市人口占主导的人口结构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90%降到 70%,在我国经历了近 20 年的时间,要让这个比例降到 30%,即达到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所需要的时间跨度还会较长。

(三)民工潮疏导有方

对民工潮加以疏导是十分必要的。参与民工潮的很多农民,属于盲目外出,一旦求职受阻,容易诱发其心理上的不满和怨愤情绪,这也许会成为社会冲突的诱因。对民工潮的疏导有如下途径:

一是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服务:通过各级和各地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尽量让农民外出有方,减少盲目性。

二是要调整国家经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民工潮主要源于一些经济发展弱势省份,主要流向是几个主要的经济热点城市。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必要调整,即加大促进经济相对后进地区如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力度,是疏导民工潮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是要促进乡镇经济发展,让农民能就近改行。如果农民不用进城就能达到其社会流动的目的,他们会选择就近就地的职业转变,也就是说离农不离乡的就业模式,就象苏南乡镇经济的发展那样。近年,在民工的主要发源地四川、湖南等省份也已经出现了一批不再出去当民工的“老民工”,他们选择留在家乡,利用在外多年所学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积累的资金,开创自己的事业。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适当,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民工潮可望被分流。

四是要切实加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对疏导民工潮具有根本性长远意义的举措。人口基本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技能的培训将改变农村劳动力“民工化”的转移方式,并能有效减少民工与城市文化的冲突。目前,我国农村的九年义务制教育还有待真正落实,职业教育还基本上是空白。为广大的农村青年提供职业培训机会,不能按照习惯性思维,将其仅仅局限于农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而是要设法给予他们相对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利用在城市已经过剩的技校和专科学校的教育资源,对农村青少年进行系统技能培训。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通畅渠道,实现民工潮的自然消减,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并推动整个农村的长远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小康。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参考文献:
[1] 刘 江. 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经济[J]. 1995(10).
[2] Ulrich Plank/Joachim Ziche. Land-und Agrarsoziologie[M]. Stuttgart-Ulmer 1979.
[3] T. L. Smith.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Florida 1967.
[4] W.Zapf.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J]. Köln 1969.
[5]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Seasonal Migration of Peasants

JIA Jin-r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seasonal migration of peasants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or rather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 is one of the conclusions of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ccordingly it consists of two processes of social movements: a relegation process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and a promotion process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 This seasonal movement of peasants has the positive meaning for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following measures must be carried out in the long term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is migration: a.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es, b.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 Good servic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d. rural form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Key Words: seasonal migration of peasants; rural social strata; social movement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